

【移民文化与历史记忆】

南雄珠玑巷移民传说形成原因探析*

芦 敏

摘 要: 珠玑巷移民传说反映了宋元明清时期由黄淮、江淮等内地中心区域或人口稠密区域向南、向西迁入珠三角、河湟、桂东南等边疆区域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它的广泛传布是社会认同的结果,基于生存竞争,移民提取了代表中原正统血脉的珠玑巷移民身份作为维度进行范畴化,当珠玑巷移民成为支配群体后,许多原住民和非珠玑巷移民也接受了珠玑巷移民认同。由于传播媒介和豫、粤两地社会发展状况的不同,在珠玑巷移民群体的集体记忆里,祥符珠玑巷被遗忘,南雄珠玑巷被凸显为祖源地。

关键词: 珠玑巷; 移民; 群体认同; 集体记忆

中图分类号: K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8)09-0122-05

有关珠玑巷移民传说,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整理汇编^①以及以珠玑巷移民为基础所进行的人口迁移史研究^②方面,多元化地探索了其背后的文化和思想意义^③。本文拟在梳理流各地珠玑巷移民传说的基础上,尝试以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探讨珠玑巷移民传说被移民群体认同的原因和过程。

一、散布各地的珠玑巷移民传说

珠玑巷移民传说主要流传于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广西东南部、青海河湟地区、河南开封等地。

1.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珠玑巷移民传说

以陈乐素、谭棣华、牧野巽、井上彻、刘志伟等为代表的学者均认为,今广府人多言其家族自南雄珠玑巷而来的说法在明代即已形成。^④《南雄珠玑巷南迁氏族谱·志选集》所收录的69姓共77种族谱、家谱序暴露出:构成南雄珠玑巷移民历史叙事的要件“宦游”“避乱”“胡(或作苏)妃之变”均于明代获得社会认可。“在这一时期,有关中原土族因避乱而由珠玑巷南迁这一混杂着历史与想象、事实与虚构的历史叙事的主要结构性要件开始逐渐在民间形成

并普及化,成为珠三角各族姓关于自身历史渊源叙事的关键一环。”^⑤如明末清初,屈大钧言“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来。”^⑥清人黄培芳、李星辉也在诗作中有类似提法^⑦。不仅家谱如此,方志也多此类记载。明嘉靖《广东通志》引《南雄府图经》曰“岭上古有珠玑巷”,“今南海衣冠多其子孙”。^⑧清乾隆《南雄府志》“珠玑巷”条云“广州故家巨族,多由此迁居。”^⑨道光《广东通志》“南雄州”言:珠玑巷,“相传广州诸望族俱发源于此”。^⑩

2. 广西东南部珠玑巷移民传说

广西珠玑巷移民传说流传于梧州、贵港、玉林、钦州一带。容县黄泥塘《彭氏族谱》载,弘公、应霄公、益公三兄弟与母亲从福建汀州府上杭县珠玑巷白石社画井村迁来。《兴业泉江村彭氏家谱》载其远祖彭真一郎来自福建汀州府武平县朱基巷;钦州、廉江《彭氏本宗支情况》载,第一代念一公自福建汀州府上杭县朱紫街瓦子巷迁来;平南县彭元祥公后裔也称其祖先从广东南海朱衣巷迁来。^⑪“珠玑巷”“朱基巷”“朱紫街瓦子巷”“朱衣巷”等多个近似名称以及指涉地点的不同,反映了珠玑巷传说在桂东

收稿日期: 2018-06-22

* 基金项目: 信阳师范学院“南湖学者奖励计划”青年项目。

作者简介: 芦敏,女,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信阳 464000)。

南一带长期通过口耳相传,以至具体内容模糊,却仍然顽强留下了珠玑巷这个核心文化符号的事实。

3. 青海河湟地区珠玑巷移民传说

在青海东部河湟地区的汉族人中,也流传着其祖先来自“南京珠玑巷”的说法。乐都峰堆瞿县的李姓、老鸦的谢姓、亲仁的张姓、马营大仓李姓等大姓,都在谱牒中记载其先祖于明初自南京珠玑巷迁来。^⑫这种情况在方志中也存在,如《民和县志》载《石氏源流》碑文“石氏祖籍南京主司巷人,洪武年间来西域。”^⑬《平安县志》载“民间多传南京苜丝巷。”^⑭西宁市《城西区志》在记载本地的明朝外来移民时,也写道“还有从陕西凤翔、宝鸡迁入河湟的汉民和来自于南京珠玑巷的汉民。”^⑮与广西的情况一样,“珠玑巷”在长期的流传中被写作了“主司巷”“珠市巷”“竹子巷”“苜丝巷”“竹丝巷”“猪屎巷”等。至于珠玑巷的位置所在,绝大多数的河湟人都认为是在今江苏省南京市,理由是青海的方言中保留着一些南京的方言词汇和语音、青海汉族的婚丧习俗与南京人有惊人的相似处、青海汉人为了纪念“南京竹子巷”而在庭院中栽种竹子。^⑯

4. 开封珠玑巷移民传说

开封珠玑巷来源于《广东新语》,内载“盖祥符有珠玑巷,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入岭,至止南雄,不忘枌榆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巷,如汉之新丰,以志故乡之思也。”^⑰屈大钧在追述先祖时,亦如此记载:“予与翁同祖翰林诚斋公,当宋南渡时,公从祥符珠玑巷来,止南雄,其巷亦名珠玑。”^⑱除此之外,目前已发现的文献中再无关于开封珠玑巷的记载。一般来说,移民传说对迁入地的影响更大一些,故总在迁入地广泛传播。北宋时,南迁移民在一路跋涉过程中,愈加思念故乡,遂将珠玑巷“作为中原和江南的象征,代表南迁人的故乡”^⑲,以为他们的“精神归宿、心灵家园”^⑳。

以上散布于各地的珠玑巷移民传说,多依据家谱、族谱和地方志而来。虽然家谱、族谱常常蕴含了强烈的情感色彩,存在较多不准确的情况,但是,它们也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需要正确解读,在解读时,“不能只以其所记述事实本身是否可靠来评价,而应考虑到有关历代祖先故事的形成和流变过程所包含的历史背景,应该从分析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入手,把宗族历史的文本放到当地的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去解释”^㉑。因此,结合其他史料记载,对涉及

珠玑巷的家谱、族谱进行解读,可以窥探当时的移民史实和移民的内在社会心理。

二、珠玑巷移民传说是移民活动的反映

各地的珠玑巷传说,共同反映了这些移民活动的起点在开封。北宋末年局势动荡,贵族、官员、商人、手工业者、农民等汴京民众,纷纷选择南渡,“男子妇人老幼,相携出东水门沿河而走者数万”^㉒。靖康元年,当高宗从淮南泗州南赴镇江时,“京师士民来者日夕继踵”^㉓。建炎三年,金军进入淮南,高宗匆忙渡过长江,“民之从者如归市”^㉔。绍兴九年,一批归附刘豫政权的将领复归宋廷,在郭仲荀的带领下,驻守东京的军人约5700人迁往镇江。^㉕此类移民活动汇聚形成了大规模的南迁移民浪潮。

由于广东相对地广人稀,便于生存,“食足无叛民,闾里得安枕”^㉖。于是,部分民众迁往广东,他们辗转到达南雄珠玑巷。南雄是进入岭南的首县,珠玑巷位于南雄县北,凡越岭进入岭南的民众遇到的第一个较大村镇就是这里,因此南雄珠玑巷就成为移民进入广东的中转站。例如,“石头陈族,其先汴梁人,金人陷汴,迁南雄珠玑里”,“又有陈珠者,亦于南宋初自汴迁南雄,再迁新会凌村”^㉗。“雷复,字阳升,河南祥符人。父潮翁,当宁宗时,以进士同知南雄府事。复少习庭训,由乡贡登进士第”,“因丁母忧,遂来南雄”,“隐于南雄沙水村珠玑巷(自是缄口不言世事)”,“子震南”,“震龙”,“后迁于广州新会之古博里”^㉘。可见,汴京移民到达南雄珠玑巷后,子孙后代再散居各地,“随着近代史上的多次移民浪潮,珠玑巷的后人更跨出中国大陆的版图,越过南中国海,越过印度洋、大西洋、太平洋,走向世界各地去”^㉙。

德祐二年(1276),元军攻陷南雄,南雄人纷纷外迁,其中大部分迁到珠三角地区。在《中国移民史》一书中,吴松弟先生依据《珠玑巷民族南迁记》和一些家谱、墓志铭,整理出211个分布在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广东中部和西南部的氏族移民资料,其中191族都显示是从南雄珠玑巷迁入的。^㉚

除了上述珠三角地区之外,一部分南雄珠玑巷民众还向西迁入了桂东南地区。民国《广西通志稿》写道“两粤氏族,尤其梧、肇诸郡,多传宋代自珠玑巷迁来。珠玑巷所在,或以为南雄,或以为南京,又或以为广州”,“则南雄之说较可征信。”^㉛明

朝时,因留戍、流放、经商等原因,很多广东人迁入广西。明初定制“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②在军籍制的限定下,平定各地后留戍的军士与其家眷一般均被编入军户,不得随意迁徙。永乐、宣德间,明与安南发生战事,故而从外省调动了不少官军进入广西。战事结束后,有些军队就留戍当地。同时,广西也是一个重要的流放地。广东曾明确规定:凡广东官民,“罪当立功嘹哨者,例发广西沿边”^③。因两广接壤,很多广东客商也进入广西,“专事生息,什一而出,什九而归”^④。遇到灾荒,湖广和广东流民还涌入广西,承耕荒田,尤其是雍正朝,在朝廷劝民垦荒政策的鼓励下,许多广东人迁入广西定居,仅桂东南的玉林地区就出现了“自城邑以至乡遂,凡闯关井廛,度地而居”^⑤的现象。因此,桂东南的汉人,十之八九来自于明清两代的广东地区。^⑥

为了巩固边防,明政府在边疆设置卫所,万历年间西宁军户人口就为二万六千余户^⑦。很多青海移民就是卫所军事移民,如《湟中县志》载清顺治三年编《张氏宗谱》:“张氏本是南京凤阳府凤阳县人,明洪武初有一祖从军征剿西番有功,补升百户,后奉朝旨与十八家迁户共防边地。”^⑧西宁市《城北区志》载《王氏家谱》:“始祖政孝公,系南京凤阳府凤阳县人,明隆庆初年从军西征,补为指挥使,至晚年弃武就农定居。”^⑨

综上所述,“珠玑巷移民传说”虽然有很多不准确的内容,然而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却能发现其中所蕴含的若干移民史实。第一,珠玑巷移民传说反映的是宋元明清时期由战乱、政府移民实边导致的较大规模或较有影响的移民活动;第二,珠玑巷移民传说反映了当时移民迁移的方向,由黄淮、江淮等内地中心区域或人口稠密区域向南、向西迁入珠三角、河湟、桂东南等边疆区域,这与当时移民活动的历史背景相吻合;第三,珠玑巷移民传说体现了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的文化关联,反映了中华核心文化由中心向边陲扩散,并与边疆文化融合而获得更为丰富的内涵。

三、珠玑巷移民传说认同的社会心理路径

如果说珠玑巷移民传说是移民活动的后果,那么为什么移民经过的其他地区没有这样的传说,为什么珠玑巷移民数量远多于实际的数字,为什么

“南雄珠玑巷”而非“祥符珠玑巷”成为众多移民记忆中的祖源地?这些问题无疑都与移民认同有关,因此有必要借助社会心理学对其进行解释。

弗雷德里克·巴斯在《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一书的导言部分曾强调“‘族群’是由组成它的个体自我归属和认同的范畴,定义族群最重要的是族群边界,而不是群体所附带的文化特质;族群的边界,不等于地理边界,而主要指‘社会边界’。”^⑩无论是珠三角,还是桂东南、河湟地区,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均处于族群认同的边缘地带。在珠玑巷传说形成的明代,国内移民迁移的主要方向之一就是由内地中心区域或人口稠密区域向山区、边远地区进行“填空式”迁移。这些偏僻的地区往往是少数民族的集聚区。当移民进入这些偏僻之地,不同族群之间便会产生互动,由此导致“我族”与“异族”意识的显现和强化。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社会是由社会范畴组成的。社会范畴依据一定的维度进行划分,不同社会范畴之间在权力和地位关系上各不相同。通过范畴化,个体会认为自己与该范畴的其他成员是相似的,而且他们具有相同的社会认同;同时,个体也会在某些维度上做出与范畴相符的行为。^⑪基于生存竞争,部分移民提取了有利于自己的维度,即代表中原正统的珠玑巷移民身份,来进行范畴化。在这部分移民群体内部,他们强调了祖源地是宋代人文荟萃的祥符珠玑巷,以此来获得比较优势。凡是该群体的个体,都认为自己与其他成员拥有相似或相同的特质,彼此之间具有吸引力,从而使珠玑巷移民群体内部产生凝聚力。于是,珠玑巷移民认同便被维持和传承下来,即便“各姓子孙,贫富不一”,但仍然尊奉着“富者建祠奉祀,贫者同堂共饗”,以至“万代永不相忘也,世世相好”。^⑫珠玑巷移民群体在与非珠玑巷移民群体的社会比较中逐渐获得了优势。他们不仅在经济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而且还谋得了区域治理的话语权,从而成为当地的支配群体。“支配群体有实际的权力去宣扬它对于社会、社会中的群体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阐释”,目的则是维护支配群体的利益,并使其长期化。^⑬相反,沦为附属群体的非珠玑巷移民对此颇为沮丧,并千方百计试图予以改善,而他们究竟采取何种方式取决于主观信念结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相信:群体之间的边界是可渗透的,个体可以从一个群体“穿越”进入另一个群体。于是,原住民

和始迁于其他地方的移民抛弃了原有的群体认同,转而接受了支配群体的社会认同,由此导致珠玑巷移民认同范围的扩大,这也是珠玑巷移民身份被大量冒称的根本原因。不管先祖是否来自珠玑巷,或确定与珠玑巷无关,很多原住民和移民仍然要在谱牒记载和口口相传中认定珠玑巷为其祖源地。

为何祥符逐渐湮不为人知,独南雄珠玑巷闻名海内外?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与此相关的主题便是“集体记忆”。集体记忆理论认为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人们从社会中得到记忆,也在社会中拾回、重组这些记忆;每一种社会群体都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借此使该群体得以凝聚及延续。^④珠玑巷移民群体的形成与变迁也是如此,共同的起源成为该群体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的传承依赖于一定的媒介,比如说与此相关的实物、文字、图像或仪式等。南雄珠玑巷的传说之所以能够流传广泛,就在于它拥有有效的传播媒介。一是族谱和家谱多将再迁地“南雄珠玑巷”记载为家族或家庭变迁的重要源头,此前的源流则在谱牒中不被重视,或语焉不详,或付之阙如。二是地方志采纳了谱牒的记载,也保存了相同的文字内容,如《嘉靖)广东通志》《乾隆)南雄府志》《乾隆)鹤山县志》《道光)广东通志》《道光)新宁县志》《同治)番禺县志》《光绪)广州府志》《光绪)开平县志》等沿袭至民国、现代的广东地方志。三是与“南雄珠玑巷”有关的实物和遗迹被大量保存和创造出来。在广东南雄,不仅有珠玑古巷,而且还留存着驷马桥、贵妃石塔、古道、诸姓古祠和南、中、北门楼等古迹以及重建的张昌故居、沙水湖、碑刻群、胡妃塑像等。^⑤这些珠玑巷的实质性纪念物和遗迹,成为散居于各地的移民回乡寻根的重要对象,南雄珠玑巷作为祖源地的集体记忆被一再强调。相较而言,祥符珠玑巷则黯然失色,目前所见的相关古文献记载只有一条,且开封早已无珠玑巷的踪影,民间亦对此毫无所知,集体记忆也就无所负载,慢慢地被人们遗忘。

当然,南雄珠玑巷之所以被牢记,也与社会现实有关。对于过去的事情而言,人们的记忆总是有选择的、扭曲的或错误的,回忆是“使当前的经验印象合理化的一种对过去的建构”^⑥,也就是说回忆中的过去并非真正的过去,而是为了现实所重建的过去。在流传着珠玑巷传说的人群中,广府人的势力最大,他们不仅分布地域最广、人数最多,而且在经济、文

化、政治、科技、体育、教育、卫生等领域占据前列,精英辈出。1995年广东南雄珠玑巷后裔联谊会第一届理事会就囊括了社会各界名流,如雷洁琼、霍英东、马万祺、黎子流、李兆基、何鸿燊、郑裕彤、何厚铨、利国伟等著名人士。广府人崛起后,迫切需要以寻根来彰显群体一脉相承的重要性,于是南雄珠玑巷便闻名于世,从20世纪90年代寂寂无闻只剩下两个牌楼、一个胡妃井、一两间祠堂的800米破败古巷,^⑦发展成为今天内涵丰富的“大珠玑”旅游区。

结语

流传于各地的珠玑巷传说反映了宋元明清时期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同时,它的形成和发展也是群体认同和集体记忆的结果。在群体认同的边缘地带,基于生存竞争,珠玑巷移民通过范畴化增强了群体认同,而非珠玑巷移民(原住民和来自于非珠玑巷的移民)为了改变因社会比较导致的劣势,也自我范畴化为珠玑巷移民群体。由于拥有较多有效的传播媒介和广府人的崛起,南雄珠玑巷成为珠玑巷移民群体集体记忆中的祖源地。由珠玑巷移民群体认同推而广之,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形成和强化也需要在开放的环境中、在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互动过程中实现,关键是要选择有利于自身的比较维度,能使民众获得自尊、自信,同时要通过多元化的媒介增强集体记忆。

注释

①主要有黄慈博的《珠玑巷民族南迁记》(广东省中山图书馆1957年印),以及南雄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后裔联谊会筹委会等组织编印的珠玑巷系列图书《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史话》(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南雄珠玑巷南迁氏族谱·志选集》(1994年)《珠玑巷古今》(1995年)《珠玑巷传说与掌故》(花城出版社,2002年)。②陈乐素的《珠玑巷史事》(《学术研究》1982年第6期),曾昭璇与曾宪珊等编著的《宋代珠玑巷迁民与珠江三角洲农业发展》(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珠玑巷人迁移路线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宋珠玑巷罗贵家南迁记》(2002年),吴松弟的《中国移民史》第4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③日本学者牧野巽认为珠玑巷传说的形成和普及体现了明中叶以后珠三角地区的汉化过程(《中国的移住传说》,《牧野巽著作集》第5卷,东京御茶水书房,1985年);井上彻在认同牧野巽观点的基础上,又指出珠玑巷传说的出现象征着珠三角地区的儒教化(《中国的系谱与传说——以珠玑巷传说为线索》,《传统中国研究集刊》2006年第1期);谭棣华和刘志伟均认为珠玑巷传说与明朝实施的里甲制有关,是珠三角民众为了证明和维持正统性身份认同的反映(谭棣华《从珠玑巷史事联想到的问题》,《广东历史问题论文集》,台北稻禾出版

社,1993年;刘志伟《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王鹤鸣、马远良、王世伟编《中国谱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9-159页);冀满红认为珠玑巷传说推进了地方认同,最终成为超越地域限制的家园符号《民众迁徙、家园符号与地方认同——以洪洞大槐树和南雄珠玑巷移民为中心的探讨》,《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2期);赵世瑜则重点呼应了刘志伟有关珠玑巷传说与国家认同关系的表述,认为移民传说扩大了地域认同,进而成为不断丰富和逐渐定型的国家认同的表征(《从移民传说到地域认同:明清国家的形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④陈乐素《珠玑巷史事》;谭棣华《从珠玑巷史事联想到的问题》;牧野巽《中国の移住伝説》;井上彻《中国的系谱与传说——以珠玑巷传说为线索》;刘志伟《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

⑤仲红卫、袁书会《作为一种文化身份的“珠玑移民”——“珠玑移民”身份的文化密码》,《文化遗产》2012年第4期。

⑥⑦屈大钧《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85年,第49页。

⑧黄培芳《珠玑巷》诗自注,李星辉《过珠玑巷有怀并序》,转引自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广东省中山图书馆,1957年,第2、3页。

⑨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一,《图经》,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影印本,1997年。

⑩梁宏勋等修、蔡必升等纂:《乾隆》南雄府志》卷三,《珠玑巷》,《故宫珍本丛刊》(169),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120页。

⑪阮元:《道光》广东通志》卷二百二十五,《南雄州》,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3963页。

⑫彭会资《广西客家人与南雄珠玑巷》,《寻根》2002年第6期。

⑬苏裕民《关于南京的珠玑巷》,《档案》2014年第2期。

⑭民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民和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70页。

⑮平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平安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03页。

⑯西宁市城西志编纂委员会编《城西区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70页。

⑰霍福《“南京竹子巷”与青海汉族移民——民族学视野下民间传说故事的记忆和流变》,《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⑱屈大钧《翁山文外》卷二,《存耕堂稿序》,欧初、王贵忱主编《屈大钧全集》第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67页。

⑲陈乐素《珠玑巷史事》,《学术研究》1982年第6期。

⑳程民生《北宋开封人才的井喷现象与历史贡献》,《河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㉑刘志伟《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

义》,王鹤鸣、马远良、王世伟主编《中国谱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9页。

⑳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八,靖康中帙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08页。

㉑王明清《玉照新志》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9页。

㉒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七十八,《食货志》,中华书局,1985年,第4340页。

㉓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三十二,中华书局,2013年,第539—540页。

㉔李纲《梁溪集》卷二十,《崇阳道中作四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2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82页。

㉕⑳⑳⑳黄慈博辑《珠玑巷民族南迁记》,广东省中山图书馆,1957年,第32、27、8页。

㉖欧如柏《我们是珠玑巷的后人——粤语方言群广东人的祖先》,《联合早报》1991年1月31日。

㉗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76页。

㉘蒙起鹏、黄诚沅等《广西通志稿》,《氏族》,1949年广西通志馆油印本;转引自郑维宽《论宋明时期广西的外来移民及其影响》,《广西地方志》2015年第3期。

㉙张廷玉《明史》卷九十,中华书局,1974年,第2193页。

㉚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四十六,《改徙犯充本省疏》,中华书局,1962年,第357页。

㉛谢君惠修,王尚贤、马神徵纂:《崇祯》梧州府志》卷二,《风俗》;转引自郑维宽《论宋明时期广西的外来移民及其影响》,《广西地方志》2015年第3期。

㉜冯德材、文德馨等:《光绪》郁林州志》卷三,转引自古永继《元明清时期广西地区的外来移民》,《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

㉝徐松石《徐松石民族学文集》(上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7页。

㉞陈新海《历代移民屯田政策对青海社会的影响》,《西北史地》1997年第1期。

㉟湟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湟中县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57页。

㊱西宁市城北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城北区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61页。

㊲弗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8页。

㊳⑳⑳⑳迈克尔·A·豪格、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著,高明华译《社会认同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27页。

㊴⑳⑳⑳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25页。

㊵刘兴洲《珠玑巷古今》,南雄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5年,第4—5页。

㊶董芳、沈逸云、夏士焱《南雄珠玑巷:七百年前桑梓乡后人世代不相忘(2)》,《新快报》2016年3月2日。

责任编辑:王轲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the Migrant Legend of Zhuji Lane in Nanxiong

Lu Min

Abstract: The migrant legend of Zhuji Lane reflects the large-scale immigration activities from Huanghuai and Jianghuai, which are the mainland central areas and have dense population, to the frontier areas such as Pearl River Delta, Hehuang areas and southeast of Guangxi in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of the legend is the result of social identification. Out of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the immigrants categorized themselves and others by taking the identity of Zhuji Lane immigrants representing the orthodox descent of central plains as a dimension. When the immigrants from Zhuji Lane became the dominant groups, lots of indigenous people and the immigrants who were not from Zhuji Lane also accepted the identity. Due to the communication media and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between Henan province and Guangdong province, in their collective memory, the immigrant groups of Zhuji Lane have regarded the Zhuji Lane in Nanxiong as the commonly identified homeland while the Zhuji Lane in Xiangfu is forgotten.

Key words: Zhuji Lane; migrant; group identification; collective memory